

為政治服務的漢代《詩》教實踐

蘇伊文 * 盧詩青 **

摘要

漢代《詩》學是儒生吸納先秦詩教闡釋，躋身政治與文化夾縫間建立起來的理論系統。礙於政權的箝制，儒生談論政經、文化問題時，必須轉化並投射於《詩》教理論的建構。詩教理論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取得詩學的發言主導權，被塑造成漢代政治氛圍下的意識型態。

由於漢代社會整體結構集體的進行互動，社會中各個結構層次通過具宰制地位（opicit）的結構框連在一起。漢代《詩》教理論之實踐與執行是漢代儒生權力與慾望的形構，構築成一完整之知識領域，並製造出漢代儒生「溫柔敦厚」之行徑，影響中國士人處世哲學的風範。

關鍵詞：《詩經》、《詩》教、漢代。

*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

** 台中市南屯區大新國小教師及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博士



Realization of the Han Dynasty “Poetry” teaching dedicated to political service

I -wen Su Shih-ching Lu

Abstract

Poetry” in Han Dynasty 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established amid the cracks between politics and culture endeavored by Confucius students who absorbed the previous poetry teaching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Qin Dynasty. Inhibited by the political domination, when students discussed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cultural issues, they had to transform and projec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s of “Poetry” teaching theories. Therefore when poetry teaching theories shadowed by the dominating Confucian studies background, they acquired the initiatives for speaking out for poetry studies; they also were shaped into the ideology unique to Han Dynasty political atmosphere as well.

Since the overall structure collectively proceeded to interactions in Han society, each of the structural layers in the society passed through the dominated status (opcit) structure and confined and linked together. Realization and execution for Han Dynasty “Poetry” teaching theories were the shaped structure; at this point the statement pointed to the shaped structure for both power and desire, therefore they formed into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domain in addition to manufacturing the behaviors for Han’s Confucian students “Gentleness and sincerity” which impacted the standards and styles for Chinese scholar’s philosophy of life.

Keywords: “Poetry and classics” “Poetry” teaching, Han Dynasty



壹、前言

《詩》教¹在歷代發揮了許多社會性功能。在先秦《詩》教已發其端²，《詩》教功能幽微滲透的在其後逐漸發酵，漢代承接先秦紛亂的局面更加發揚透顯。在歷史上，漢代可說是繼亡秦之後第一個真正實現了大一統。而此一局面，卻是經過春秋戰國以來幾百年分裂與兼併的劇烈洗禮。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引賈誼的〈過秦論〉曾提及：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³

然而，秦王並不以「守威定功」的迎合人心方式，卻是「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終至自取滅亡。賈誼透過〈過秦論〉，反省了為政之道的常與變，啟發了我們重新審視歷史表象背後的文化心態。

公元前206年，秦朝終於被沛公劉邦所推翻，代之而起的是漢朝。根據《史記》〈平準書〉記載：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餉，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⁴

由於秦末的連年征戰，經濟遭受嚴重破壞。漢朝初興時，承接著秦朝凋敝的

1 關於詩教理論的研究，目前可見大多是以先秦儒家的詩教思想為研究對象。「詩教」可說是中國詩歌史上流傳最廣遠、影響最大的詩論主張之一。從孔子明確以《詩經》當作教育範本開始，一直到清代，幾千年間，對它的討論都不曾間斷過。關於「詩教」議題，可先分為「《詩》教」與「詩教」兩大類。前者指的是先秦時代以《詩經》為基礎，所形成的「《詩》教」相關論述；後者嚴格說來則應指由「《詩》教」所開展、擴充出的以廣義詩歌為基礎的論述。

2 以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為研究對象，有林耀濱《先秦儒家研究》，台北縣：天工書局，1980年；康曉城《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年。

3 見日本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學人版），台北市：洪氏出版社，1986年9月，頁135-136。

4 見日本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學人版），頁524。



政局，社會生產艱困，物質十分匱乏。漢高祖憑藉人民的力量奪取政權，又親歷戰亂，深知人民對政治的要求。於是，漢初帝王採取一系列的休養生息措施，使天下安定，社會祥和，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其後文景之治立下漢朝富強基礎，至武帝時確實享受到了可觀的成果。見《漢書》〈食貨志〉：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

漢初隨經濟政治的發展，統治者為鞏固政權，必須吸收前人一切有益的知識經驗做為借鏡，於是高祖就提倡著書、獻書。在此氛圍下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又再度復甦，尤以經學更盛。武帝時宰相董仲舒將各家學說在維護禮教和服從中央集權的宗旨下加以統一，成為當時統治者思想的理論根據。⁵

儘管當時漢代並無科舉考試，亦無四書五經名稱。但是當時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國學廣設五經博士，整體的大環境受到儒家思想的浸潤與陰陽五行的薰染，經義在文學詮釋中一直佔據著主導性的地位。經義來自儒學義理的闡發，以先哲孔子及其弟子的傳承為依歸，儒生在歷代擔負著政治社會秩序以及文化秩序的任務。

漢代《詩》學是儒生吸納先秦《詩》教闡釋，躋身政治與文化夾縫間建立起來的理論系統⁶。礙於政權的箝制，儒生談論政經、文化問題時，必須轉化並投射於《詩》教理論的建構。當詩教理論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取得詩學的發言主導權，被塑造成漢代政治氛圍下的意識型態。因此，本文以《史記》中所反映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過程；以及《漢書》「實錄」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呈現漢代《詩》教在當權者和漢代儒生所共同形塑而成的政治功能關注要點。

⁵ 詳見許仁圖編著《新編中國文學史》，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9年，頁119-120。

⁶ 漢代儒生試圖從儒家觀念詮釋《詩經》建構漢代詩學的理論系統，包括詩言志、詩教、發乎情、止於禮義、思無邪等各種觀念。在漢代之前所涉及之典籍包括《尚書》〈舜典〉的詩言志觀、《論語》中的思無邪觀、《孟子》之以意逆志觀及知人論世觀、《荀子》的以禮解詩觀等，在漢代所涉及之典籍包括《禮記》〈經解篇〉中的詩教觀、〈詩大序〉的詩言志觀、美刺正變觀、發乎情止乎禮義觀以及毛傳鄭箋所闡發的觀念。



貳、漢代《詩》教理論的形成

《禮記》〈經解篇〉曰：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此處雖稱引孔子之言，其實應該是漢儒的說法。⁷在秦時有七十博士幾乎全是儒家，而叔孫通、陸賈、張蒼替漢朝開啟了以儒立國的大道。至漢朝接受儒家與經典已是無可抗拒的大勢所趨。

漢代儒生承傳先秦有關《詩》的種種觀念，在《詩經》詮釋的過程中推闡發揮。故漢代結集或著述的詩學文獻中，吸納了先秦儒的儒家觀念，透過《詩經》的多方詮釋，開展出漢代《詩》教理論觀念。

《詩》教理論並非漢代儒生的獨創，其取擇推闡的資源在先秦儒所開發的儒家觀念，但其理論的完備較之先秦儒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因漢代注重經學，專門講論之故。在漢代的整個詩經詮釋學中，理論的誕生與詩的實際詮釋本應該是互動的，但許多理論取擇自儒家觀念，所以先前的觀念仍有一定的指導性。

一個時代思潮的形成，一定是前有所承，加上當代知識份子思考當代政經方面的問題，融合而成的思想路向。任何時代所產生的問題，是知識份子針對某一時代的某一問題進行思考辯證，使其思想和時代社會發生緊密的關聯性。當漢代知識份子思考漢代政經問題時，面對政統與道統之雙重壓力，不得不思索生存方式，於是利用儒家的《詩》教觀，來展現其思想進路，以尋求政統與道統之融合。

《孟子》〈萬章上〉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⁸可見詩中是存有詩人的情志，詩人創作時憑藉感情之驅動與流布，縱橫心志想像馳騁，引發讀者進入詩人的想像空間中，共同體驗創造的過程，以達心靈感通的境界，於是形成創造性的欣賞。讀者必須懂得適切地設身處地去體驗作者的感情，因為詩人的情志不是表面意義，而必須以己之意去尋得其志，才能瞭解詩人的本意，孟子以意逆志的目的是要探尋詩人之志，但是詩意總是隱晦不

⁷ 馮友蘭先生指出：「在漢朝人的著作中，稱引『子曰』的地方太多了，大概都是依託。……用『子曰』以加重語氣。」見《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大陸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24。

⁸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印本《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頁164。



明，只好以知人論世的方式來探索之，而志與社會環境有關，時代會觸發詩人之志，故必須進一步瞭解詩人所處之世，亦即是進展至「論世知人」，所有孟子接著於《孟子》〈萬章下〉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⁹詩、書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情志，而思想情志一定會受到時代環境的制約，於是要求瞭解作者的生平事蹟及其所處之時代環境，如此才能正確地把握住作者之志。可見孟子之論世知人是具有史觀的，是一種歷史研究法之運用，漢代儒生運用「論世知人」解詩法為每一首詩作時空的定位，是儒家觀念運用模式。

由於漢代《詩》教理論具有為政治服務的社會功能，「論世知人就既要有現實感，又要有歷史感。」¹⁰因此，〈詩大序〉、〈詩小序〉中寄寓心中之情志，借用《詩經》之詩文來行諷諫之實，表彰漢代儒生道統觀與政統觀之陶鑄融合。

參、漢代當權者和儒生所牽涉的《詩》教政治觀點

一、儒生身分與當權者的權力互動

漢代儒生以《詩》三百為諫書，原出自漢儒王式之口，《漢書》〈儒林傳〉中描述昭帝崩殂後，繼位者昌邑王行淫亂廢，王式下獄當死之前，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王式回答曰：「臣以《詩》三百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王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篇諫，是以亡諫書。」此乃是繼承了先秦儒家思想中「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等觀念，要求在上位者必須要以民為本：要多聽聽人民的聲音，關懷詩中所欲傳遞的隱喻訊息，以瞭解民生疾苦，改正不善的政治作為。故漢代儒生先引導君王瞭解詩中的美刺作用，藉以讓君王聯想到人民的辛酸苦楚，然後能進一步瞭解人民的辛酸苦楚乃政治因素的影響，所以必須要修改君王自己的施政作為，此為由下對上傳遞話語的詩教方式。但事實上並不是每一位君王都能具有如此寬容大量的氣度。以《詩》為諫的理想終究是理想，殘酷的現實是上對下的權力話語較為強勢。因此，漢代《詩》教理論應是儒生內在自我集體意識的覺醒，與外在專制政權有形或無形之抗衡。此兩

⁹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孟子》，頁188。

¹⁰ 語見斐斐：《文學概論》，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頁341。



者之間形成特殊的權力架構，構造出牢不可破的意義語言，以鞏固漢代的《詩》教理論。

然而，儒生在依附政權下道德化、政治化與方士化之矛盾性格，將如何為開創自己及國家社稷之前途而努力不懈？再鋪敘當時之政治社會背景，以進入統治權力之核心？其實，當統治權與文化權之間的權力交涉、搏鬥展開後，儒生所形成的意識型態以及溫柔敦厚的行徑，建構出《詩》教理論之權力化。因此，所有知識領域之建立皆是由儒生與權力之間相互作用所產生的話語結果。導因為果，追果溯因，皆脫離不了漢代獨特的《詩》教理論與政治權力兩者之關連性問題。可說，《詩》教理論之價值觀與漢代儒生之意識形態是密不可分的。意識形態是《詩》教理論與權力之間的連鎖關係，其背後所隱含之政治型態，是漢代儒生運用《詩》教理論解讀《詩經》文本時所得到的意義，為後代的權力與文學之間樹立溝通融合的典範。

事實上，漢代之儒生已不像先秦之道統儒生，漢代儒生夾雜著陰陽五行之思想，為何如此呢？為的是在政權之下，尋求一安身立命之所，不得不為之，繼而伺機而動，等待發揚儒家《詩》教之精神。

漢代儒生以儒家之通經致用為最高指導原則，面對君王時，不忘勸諫一番，以《詩經》來行勸諫之用，所以《詩經》話語具有諷諫的意涵。自漢代完成統一大業之後，漢代之儒生比先秦儒者承受更多之政治壓力，他們游走於專制政體之間，為了現實層面之考量，不得不屈服於專制政治的淫威之下，成為政權控制人民所運用的工具，如叔孫通便是一位政治儒生，他是第一位為漢高祖制定朝儀而受重用的政治儒生，被漢高祖封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從此之後，漢高祖開始大量重用儒生，其實叔孫通之如此願意為專制政權服務，實因為不得不為自己在專制體系中尋找一生存的罅隙，他以「尊君卑臣」之奉承理念為漢代專制政權服務，將皇帝之地位置於最高點，而得到皇帝的賞識。他們希望以儒家之道德理想來感化統治者，試圖從內部轉化著手，以勸諫之方法和儒家思想制約王權的模式，於現實政權與文化理想之中，展開艱辛之搏鬥歷程，有時亦必須作某些程度上的妥協與讓步。不過他們仍然秉持儒家思想，緩慢朝著轉化之目標努力以赴，雖然犧牲者眾，但永不放棄的堅持，使他們成為道德化之儒生。

例如董仲舒便是一位道德化之儒生，雖然董仲舒之天人感應說也加入陰陽五行說，亦是方士化之儒生，不過其背後有一偉大目的，便是建立一道德思想來



制約皇帝，所以將其歸於道德化之儒生。他試圖建立一合法化之思想體系來規範統治者，一方面他屈服於專制政權之下，一方面向漢武帝提出獨尊儒術的建議，希望能從中建立一個大的思想體系來涵蓋政治，使政權能較為合法化。董仲舒表現出溫柔敦厚的行徑，並朝向止乎禮義之目標邁進，建構出漢代儒生之「溫柔敦厚」的意識型態。而此種意識型態之效用最大，影響層面最為深遠，與《詩》教系統之建構不謀而合。

《漢書》〈陸賈傳〉記載陸賈批判漢高祖「馬上得天下，焉能馬上治天下」之言，希望以學術、理想來制衡專制政治，以節制太過膨脹之王權，陸賈亦屬於是道德化之儒生，其文載之曰：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勤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階下安得而有之？」高帝無懌，有慚色。

漢代承秦，建立大一統之專制政權，來自民間草莽的漢高祖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之言來自我蒙蔽，清楚地說出文化與政治之差異性很大，當漢武帝以武力創造其政權之後，一介武夫，怎能明瞭《詩》、《書》之重要性呢？亦無法理解《詩》、《書》與文化之關係，雖然陸賈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之言來為詩書做辯解，期盼以詩書之文化與政治之權力相結合，可惜事與願違。

西漢末年，劉歆整理皇宮的圖書時，發現很多古代的文獻史料，劉歆想將這些文獻表彰出來，可是心中明白太過於學術的文獻，皇帝是不會喜歡的，必須要加入一些皇帝感興趣的東西，以吸引皇帝的注意力，於是他在《左傳》中加入五德終始說的內容，而且為了迎合王莽政權，還做了一部《世經》來證明王莽是正統的王朝國祚，以證明王莽是「真命天子」，而儒生正是幫助皇帝登上真命天子寶座的得力助手。為了政權合理化所編造之神話，利用語言詮釋的力量，將政治意識體現。於是大量的陰陽五行讖緯之說興起，儒生也因此而方士化。

王充之《論衡》是反映中國政治思想的另類試探，以言語、論述來詮釋另一方面之權力架構，王充對於董仲舒之天人感應說及人副天數之假名擴權的詮釋，特別指出無任何證據可證明天命天意之說。



「自漢以來，經學的興衰或其內部的演變，都有其理路與規律可尋。漢初於多年戰亂之後，亟須休養生息，加上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使儒學受到的重創尚未恢復，戰國時期興於齊國稷下的黃老之學於焉臻於極盛。」¹¹漢初剛剛經過戰亂的摧殘，天下人民亟須休養生息，於是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趁虛而入。整個漢代前期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程度大、層面廣，從皇帝至民間，一切事物氛圍籠罩黃老無為之色彩。漢武帝時，採用董仲舒之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風氣為之一變，《史記》〈儒林列傳〉云：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¹²

自此儒家展開了溫和之思想箝制作用，與政治搭配得宜，相得益彰。於是自漢武帝開始立五經博士，廣開弟子員，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到東漢之大學生已增加至三萬多人。從此，儒家成為漢代學術思想的主流，亦成為中國學術之正統思想，影響中國兩千餘年之學術發展。從漢武帝尊崇儒家開始，以表彰六經為依歸，「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凡是不屬於六藝範圍者，皆不能進入官學，因官學中會設立博士、置弟子等以研究六藝。儒生於官學中獲得制度化之保障後，在中央有博士弟子員，在地方上則有郡國學官，為博士弟子之候補人才，民間私學從漢武帝開始而得到國家之保障，成為基層官僚人才的培育場所，彷彿回到官師政教合一的局面。於此，儒生透過制度之更張，及皇帝喜愛儒學，於是儒生成為漢代思想的主流，以仁義治國為其教化之特色。

古代士人從小接受「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禮記王制）之教育開始，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人文素養來完成其參與政治的路徑，擔負起政治與文化融合之使命，企圖以人文之素養來提昇政治之理想化。但是此重責大任何其艱鉅，文化與政治之間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又是非常難以化解的一大難題，士人身處其中，所扮演之角色，似乎具備著悲劇的色彩，似乎註定要成為悲劇人物。當文化權與統治權相抗衡時，其間所造成之矛盾衝突是不容易化解提昇的，因為權力架構之勢力永遠會以政治手段來掌控文化權，例

¹¹ 參見洪春音：《朱熹與呂祖謙詩說異同考》，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頁43-44。

¹² 見日本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學人版），頁1287。



如以《詩經》當做政治教化之工具，來達成其政治企圖，是最常使用之方式。

二、詩教理論的權利化

「西漢知識份子的壓力感，多來自專制政治的本身，是全面性的感受。而東漢知識份子，則多來自專制政治中最黑暗的某些現象，……是政治上局部性的壓力感。兩漢知識份子的人格形態，及兩漢的文化思想的發展方向，與其基本性格，都是在這種壓力感之下所推動、所形成的。」¹³西漢的專制政治是指皇帝一人的專制政體，東漢之最黑暗的專制政治是指外戚、宦官之屬，兩者對於漢代儒生之壓力，可謂大矣！

漢代至漢武帝時，加設博士官、明經、明法之科，及選舉孝廉之官，此種政教體系，成為漢代政治權力鬥爭的特有現象，於是《詩》教系統在此種政教系統的影響下，使得漢代詩教理論呈現出特殊的權力化。

《詩經》最早於漢文帝時列入學官，〈毛詩序〉對《詩》三百篇的分類（四始、六義），不僅擴大了《詩》的教化功能，同時也強化了《詩》與大一統政治的關係。¹⁴而此大一統政治的關係便是政治權力。

毛公因古序而作傳，在《毛傳》〈關雎〉一開始便明白揭示「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之倫理思想體系，從家庭倫理至社會倫理，井然有序，層次分明。其中君臣之道，影響著政治權力與文化使命之間的權衡關係。

《詩經》之美刺與諷諫精神，是衡量漢代文學價值的基本準則，故其與權力交涉時，便形成美刺的權力話語與諷諫之權力話語，如「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¹⁵、「上以諷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¹⁶、「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¹⁷等。美刺是詩人對於美好事物之讚美與醜陋事物之譏諷，以達勸善懲惡的目的，將作者之

¹³ 語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頁282。

¹⁴ 語見許結：《漢代文學思想史》，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65-166。

¹⁵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5。

¹⁶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6。

¹⁷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7。



情志藉由美刺表達出來。如《魏風·葛屨》云：「維是褊心，是以為刺。」¹⁸此為「刺」，而《大雅·崧高》云：「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¹⁹此為「美」。「美刺說」是漢代儒生解詩之根本，於解詩時喜好加入陰陽五行、讖緯災異等方術之說，故其《詩》教已非孔子詩教之本來面目。漢代儒家思想，亦非孔子原來之儒家思想，不過徵聖、宗經、原道之思想，仍然影響漢代《詩》教理論之發展。但是詩人借詩行美刺之實，仍然是不變的。因為詩的教化作用與美刺作用有關，美刺是就人民的立場言，可以泄導人情、補察時政。

漢代儒生中，以鄭玄對《詩》教影響最大，其為毛詩作箋，認為《詩經》乃是居下位者的儒生因憂國憂民、褒揚善意、貶抑惡性的作品，善惡是評斷君王是否善於體現儒家聖王之道，是否能為國家社稷盡心盡力，於是儒生作詩以諷諫，希望君王能觀詩以知民情，能觀詩以反省自身，進而從中得到治國之道。

孔穎達於《毛詩正義》中云：

其作詩也，本心主意，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播之於樂。而依違諷諫，不直言君之過失；故言之者無罪，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也，聞之者足以自戒，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²⁰

表明詩人作詩之原則，必須要委婉曲折，不要直接刺傷君王之尊嚴，若違反此一原則，則容易遭受災禍，反而達不到其政治目的，無濟於事。

《樂記》云：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²¹

正風、正雅是治世之音，變風、變雅是亂世之音，皆是為了表達詩人對現實環境之不滿和對以前之懷念，而「發乎情，止乎禮義」正是「變而不失其正」闡發，正變精神正是詩歌反映時代政治之治亂興衰的最佳證明。

漢代儒生以「詩言志」的模式來關懷政治社會，其乃為「家國天下之志」，運用《詩經》中之風雅比興來傳遞心中之情志，對於詩內容之要求為合乎道德性之「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標準，以作為權力運作之價值判斷，因為《詩》必須

18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207。

19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673。

20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6。

21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頁14。



具備美刺與政教之功能，其美刺功能影響風雅頌之創作規範，其政教功能造就溫柔敦厚之儒生行徑。漢代儒生運用其來「主文而譎諫」地勸諫漢代之君王，其溫柔婉轉態度結合政治權力因素，是《詩》教理論權力化之明證。

肆、結語

在任何一個社會中，人們必須被形構（be formed），以便適應他們的存在條件的需求，因此，意識型態就變得很必要；而意識型態通常是通過能使現狀合法化，支持社會現實的非人格化結構而強加在每一個人身上的。²²漢代社會延續詩教的作用依賴意識型態的實踐，當時儒生通過此行為，定位其與當權者的互動關係。

由於漢代社會整體結構集體的互動，將社會中各個結構層次通過具宰制地位（opcit）的結構框連在一起。漢代《詩》教理論之實踐與執行是漢代儒生所掌握的形構，此言說是權力與慾望的交織，構築成一完整之知識領域，並製造出漢代儒生「溫柔敦厚」之行徑，影響中國士人處世哲學的風範。

漢代儒生與政治權力交涉之後，建構出《詩》教理論之權力化的文學理論，文學理論都具有政治意涵。漢代儒生並不會刻意去挑戰政治權力，而是游走掙扎於政權與道統之中，沉浮之間受制於意識形態的力量，於是有意無意地幫助維護與鞏固此一政治體制。發生在《詩》教理論的建制過程，使其成為漢代意識形態的表徵，亦涉及《詩》教理論的建制與政治統治整體社會權力利益之間的權力關係。

而漢代的《詩》教理論便是儒生運用權力來廣佈《詩經》的政治教化功能，權力之運用以影響的方式呈現，其影響層面深遠。權力和知識是相互交叉的，是漢代儒生掙扎於政統和道統之間，希望能扮演好為君之臣的身分，即統治權；並能兼顧教化之身分，即文化權。此二種權力是錯綜複雜的交互作用，目的是為政權尋求最佳的合法性，以利權力的擴展，將天之權等同於君之權。天道乃為君道，君代表天，正是隱含權力的意涵，以為君權尋求最佳合理性。

所以當儒生與權力交涉接觸時，或選擇抗衡，或選擇妥協，或選擇於妥協中

²² 詳見李英明：《晚期馬克思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p65-67。



尋找生機，或於抗衡後另闢生存管道，方式多樣化，但大原則是以前家思想為依歸，借用不同方式來完成儒家思想中內聖外王之功夫。當儒生以不同面貌去面對政權時，所產生之行徑，或為妥協下之溫柔敦厚，或為抗衡後之慷慨就義，儒生內心產生波瀾壯闊、波濤洶湧的之矛盾，儒生所展現之生命力是旺盛而永不能摧折之優良典範。



參考書目

- 日本瀧川龜太郎、魯實先、陳直：《史記會注考證》（學人版），台北市：洪氏出版社，1986年9月。
- 東漢·班固：《新校漢書集注》，台北市：世界書局，1978年11月。
- 林耀潏：《先秦儒家研究》，台北縣：天工書局，1980年。
- 康曉城：《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3年。
- 許仁圖編著：《新編中國文學史》，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9年。
-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三冊，大陸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孟子》，（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85年，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印本《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
- 孔穎達奉撰：《十三經注疏—詩經》，（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85年，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重印本《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
- 斐斐：《文學概論》，高雄市：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一，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
- 洪春音：《朱熹與呂祖謙詩說異同考》，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
- 李英明：《晚期馬克思主義》，台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